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修订本)

钟叔河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修订本)

钟叔河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修订本)/钟叔河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系列)

ISBN 7-5343-6891-X

I. 中...

II. 钟...

III. 东西文化—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近代

IV. 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204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修订本)

作 者 钟叔河

责任编辑 曹 军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 本 960×635 毫米 1/16

印 张 11 插页 2

字 数 91 000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100

定 价 14.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tradition)的冲突,是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最基本的事实。但如果认为此二者绝不相容,又势必导致现代化近似于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的公式,这与东亚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历史不太相符,至少日本便是一个相反的例子。近年来,我越来越对中日两国在“西潮”冲击下反应之异同发生兴趣,很想做一点比较的研究。故于黄遵宪《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下泊戴季陶、周启明诸人之著作,一一求而读之,自觉稍有心得。本集中《论黄遵宪的日本研究》一文,便是我在这门功课上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当然,我对现代化(modernization)问题的研究的范围还不限于此。E. Black 在其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一书中论述到:“任何社会之变革,首视其领导阶层之信心为何如,而信心之来源又每每系于传统的价值观与制度。”此一论述,实至为深

刻。在现代化过程开始即“西潮”袭来之前后，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一直是儒家的士大夫。所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士大夫阶层面对“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的态度。在这方面，郭嵩焘实在是第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他于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在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即已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即尼山诲人不倦，不过曰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而已。佛氏之法，则舍身以渡济天下……西洋基督之教，佛氏之遗也。……圣贤不欲以兼爱乱人道之本，其道专于自守；而佛氏之流遗，至西洋而后畅其绪。

又进一步述评“西洋基督之教”云：

其言曰，视人犹己……继绍乎天以成其事业，实有继事述志之责。故其自视常若天之子，而凡同为人以并生于天地之间者，皆兄弟也。……固不能逮佛氏之精微，而其言固切近而可深长思也。

这里将“中国圣人之教道”即儒家传统价值观和“西洋基督之教”即西方价值观所做的比较，远远超越了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水平。

郭氏还对中西制度之不同发表了看法：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

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自始设议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

又云：

（中国）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者也……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惠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郭嵩焘深知“中国成法，遵行已三千余年，本不易言变通”，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可惜的是，他在当时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中居于绝对少数的地位。朝廷认为他“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清议讥刺他“不见容尧舜之世，何必去父母之邦”；乡绅集议要捣毁他在长沙的住宅；京官更有奏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的。此种情形，终于使他“仰天歔歔，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靡，才智聪明亦为之遏塞”。

本集中《论郭嵩焘》一文，我是带着崇敬和惋惜这位同乡前辈

的感情写出来的。中国在 19 世纪失去了大好的时机,这是郭嵩焘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

然而,尽管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是如此的“足乎己无待于外”,尽管它的排他性和“专于自守”是如此的顽强,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随着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输入,在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中,毕竟也开始孕育(或蜕变)出了第一批带有 intellectual 即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色彩的人物,徐建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动摇性、曲折性、软弱性、反复性,非常具体地反映在像徐建寅这样一个满怀忧国忧民、毕生追求富强、终于无可奈何、不得志于当世的技术专家的身上。徐建寅基本上不谈政治,看得出在一些重大关头他宁愿“绕开政治走”,但是政治却始终没有放过他,从好的和不好的两个方面说来都是如此。百日维新时,他被起用任新设立的“农工商局”的“督理”,“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戊戌政变发生,农工商局旋即被“裁撤”,徐建寅也只得借口“扫墓”,脱离政界,归隐家园。后来张之洞请他到湖北办火药厂,他成了一个“日手杵臼,亲自研炼”的纯粹技师,终于在一次试验事故的爆炸中牺牲了生命。本集中《技术专家徐建寅的教训》一文,对于后人应该可以引起一些思索。

郭嵩焘、徐建寅和黄遵宪,他们作为最后一代士大夫和最早一代中国的 intellectual,在“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中无一例外的悲剧性结局,并不应该使今天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我们丧失信心。郭嵩焘卒于 1891 年,徐建寅卒于 1901 年,黄遵宪卒于 1905 年。

他们都是19世纪的人物,属于过去的时代,没有可能战胜(甚至也没有可能公开反抗)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继续着使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H. N. Shore 评论容闳时写道: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这段话我极为喜欢,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是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看到这个伟大的力量并且努力来激发并加强这个伟大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真正伟大的国家,就是我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的使命。

【重印题记】 本书是我的史学论文集,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后,内地迄未刊行。此次重印,由我作了些必要的修改,并且增加了插图。2005年8月28日钟叔河记。

目 录

序言	(1)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1)
论黄遵宪的日本研究	(10)
论郭嵩焘	(58)
技术专家徐建寅的教训	(117)
晚清旅西记述的价值和意义	(147)

图版

容闳在耶鲁,1854 / 原版《西学东渐记》	(8)
黄遵宪画像	(11)
《日本杂事诗》定本书影	(46)
郭嵩焘铜版画像	(59)
郭夫人(梁氏)在伦敦	(75)
郭氏记阿斯福(牛津)大学馆	(96)
徐建寅像	(118)
《欧游杂录》介绍早期的“机器人”	(130)
斌椿《乘槎笔记》/ 志刚《初使泰西记》	(148)
蒲安臣使团中的志刚和张德彝	(159)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四十年来，无数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赶上先进的国家？也就是如何从故步自封的局面中解放出来，迅速地、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闭关自守是专制宗法社会的特征。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把人们束缚在狭小的地面上。由科举和理学作育而成的观念，禁锢着人的头脑，压抑着人的精神，使人们缺乏力量去想象和追求一个广大的、多样化的世界。当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逐步发展起城市经济、航海通商和近代文明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专制国家。直到英国兵舰驶进广州内河，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吉利在什么地方，与中国有无旱路相通。连头脑清醒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也曾以为英国兵的腿足不能屈伸，上了岸就不能打仗。这就像一个蒙上眼睛的人，遇到野心勃勃的对手，挨

打吃亏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林则徐、魏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从吃亏中吸取教训，最早提出应当了解外国（“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和学习外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所谓的“悉夷情”和“师夷长技”，都是为了“制夷”——遏制外国的侵略。他们不仅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也是为了祖国富强而探索走向世界的道路的先驱。中国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确实应该从他们写起。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这一百四十年的前七十年中，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开始有了新的世界观。但是，一方面由于积重难返，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曲折和徘徊，后七十年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近几年纠正极“左”那一套之后，国家才有可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当然，国家利己主义是客观的存在，发达国家势必要占不发达国家的便宜。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也确有少数人屈从于列强，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但这种人绝不是林则徐和魏源，而是那些本来最顽固、最守旧、最保守的统治者。他们和人民尖锐对立，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能靠闭关自守保住江山。一旦“关”闭不住了，又是他们最怕老百姓乘机造反，最容易屈膝投降，崇洋媚外，在“保护伞”下去做儿皇帝和奴才总管。至于一百四十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他们赞成开放，反对封闭，是为了赶上先进国家，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绝不会拜倒在洋人脚下，成为洋人洋货的奴隶。

若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一番纵横观察，即可发现，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它既是中外交往史，又是文化思想史；既是政治史，又是生活史；既是“西学东渐”史，又是反帝斗争史。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重温一下这些历史，我认为是十分有益和有用的。

前面说过，1840年英国打到广州来时，中国人对于欧洲还一无所知。关于“泰西”，通行的还是“洋鬼子挖眼睛合药”一类荒诞无稽的传说。怎样由无知变为有知呢？只能靠直接去接触和了解。1876年到费城参加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中国工商界代表李圭，在其著述《环游地球新录》中说：

地形如球，我中华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之。今率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

这完全是实话。地球是圆的，今天连小学生都懂得；但在当时，却振聋发聩，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戊戌领袖康有为，就是在他22岁读了《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后，才立志“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再以对荷兰的了解为例，《明史·和兰传》云：

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皆赤，足长尺二寸。……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

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这明显是荒诞的“天方夜谭”。但斌椿于 1866 年访问荷兰后写的《乘槎笔记》，和《明史》就完全不同，可以说是“纪实”了：

荷兰纵六百五十里，横三百五十里，西北滨大西洋海，夷坦无山，港道纷歧。民受水害，因习水利，善筑堤，又善操舟行运。南洋各岛国，皆建立埔（埠）头。

由是观之，所谓“百闻不如一见”，确实是不错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对外部世界由无知变为有知，封闭社会也就自然会变为开放了。

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19 世纪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为了扩大眼界，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学习先进，救国救民。在这方面，人们往往需要克服比远海高山更难超越的障碍。当第一位常驻欧洲的使臣郭嵩焘接受任命时，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骂他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者把外国人一概骂为“鬼”，把正常的外事活动斥为“事鬼”，倒可说为一百年后戚本禹之流指使红卫兵烧外国使馆的“不怕鬼”

行动开了先河。其实,这不过反映了破落户对新世界和新事物的盲目恐惧和极端仇视,和人民群众对列强侵略的抵抗和愤怒,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研究人类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种文化绝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有没有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的能力,正是衡量一种文化生命力强弱的标志。到清朝末年,统治者的思想已经完全僵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危机;但是植根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没有和专制统治一样完全老化和衰朽,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

曾纪泽出使英法时,也遇到了和郭嵩焘同样的情形。不少人反对他讲西学、谈洋务,说什么凡是先圣昔贤没有记述过的道理,凡是六经典籍没有记载过的东西,学者都“不得过而问焉”。曾纪泽在一篇文章中驳斥他们道:

夫先圣昔贤之论述,六经典籍之记载,足以穷尽宇宙万物之理若道,而不必赅备古今万物之器与名。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慨然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唐塞之,不亦泥乎?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舞于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创局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

曾纪泽并没有否定“先圣昔贤之论述”、“六经典籍之记载”,但他

强调指出，不能靠“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来适应“五千年未有之创局”。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已经不在人间，他们并不了解当今的世界。对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由我们自己通过直接接触去考求，这样才能扩充我们的知识，应付当前的局势。对于这件事情，是既不应简单拒绝，也不必畏缩害怕的。

“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这是一种何等博大宽容的态度啊，它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部分的积极的传统，说明古老的中国文明还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当然，这也得有曾纪泽这样“不以其异而诿之，不以其难而畏之”的态度。应该说，在早期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持这种态度的人相当多；忘记祖宗、盲目崇外的人当然不会没有，但这种人在历史上是毫无地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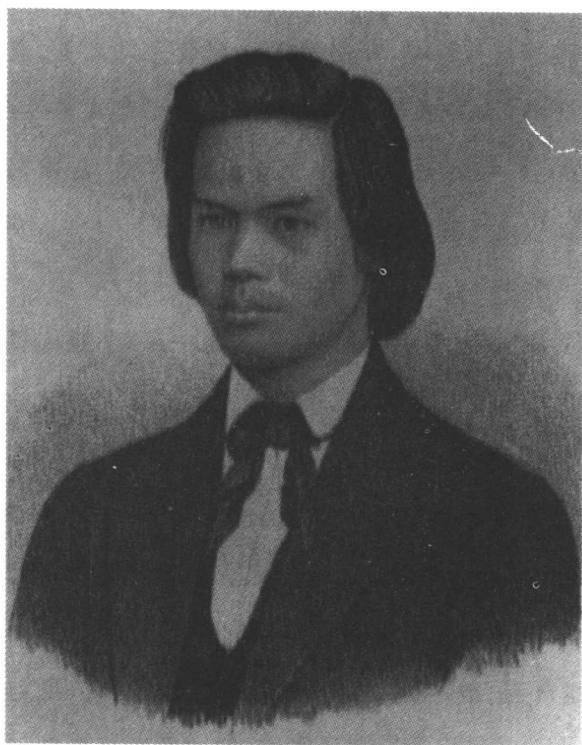
欧洲（后来还包括美国和日本）用几个世纪时间，在吸取东方、南方和新大陆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是全人类都有权继承的公共遗产。连曾经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19世纪“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19世纪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所想要“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的，首先是坚船利炮，接着是化电声光，最后终于接触到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在这方面，直接的接触和观察，对于人们认识的提高和深化，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中说：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羨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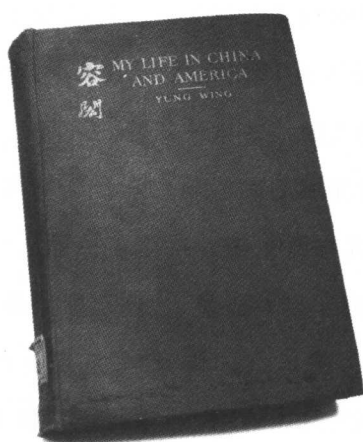
到他之后的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就更上一层楼，正式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西方的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他们的理想落了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永远也无法否认的。

对于西方文化中那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对于某些西人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大部分出去的人也并非不能够及时识别并进行反击。张德彝和同文馆同学到欧洲游历时，年纪只有十八岁。据《航海述奇》记载，有次他们在英国参观博物院，见到那里将从圆明园抢去的文物作为战利品展出，便立即中止参观，表示抗议。后来在俄国公园里遇到一群妓女，有个外国人故意跟他们开下流玩笑，问他们想不想“及时行乐”，张德彝又正言斥责，直到外国人表示道歉。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从细小的地方，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青年在外国人面前的精神状态。

由五千年历史冶铸而成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渗透在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绝不是几番欧风美雨冲刷得掉的。《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的父母，送他到外国人那里读书，本来只是“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可是当美国教会提议资助他进大学，条件是“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时，年轻的容闳立即断然拒绝。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



容闳在耶鲁, 1854



原版《西学东渐记》